

走出文革連載5

走出文革

槐樹下的記憶

(接上一期)

其實，小陸費除了胖，穿吊帶褲和戴金絲眼鏡，倒也待人和氣，并不擺小開架子。大樓裏被人稱之為“小開”的另有其人。

上海灘的紅塵俗畫，如果没有小開，便少了好多神韻。讓阮玲玉和周璇陷於情感之中不能自拔的便是兩個上海灘的小開。可見，小開的名聲雖然欠佳，但舊時滬上的女子却又魂不附體地迷戀他們。用葛優的話來說，上海的男人群少了小開就像是“炒菜沒放鹽，喝酒少了烟”。因此，上海大樓裏有人當選為小開并不奇怪。

但這被起了小開綽號的那位，并不是可以開寶馬飆車撞人的富二代，也不像小陸費那樣有二十年定息可拿。大樓裏的人叫他為小開，是因為他平時衣着光鮮，還像周立波一樣“頭勢”清爽，油光靚亮。小開真正的資本是他“賣(讀ma)相”好，舞也跳得好。他的

最驚人的豐功偉績是奪走了“阿歪(讀hua)”的標致老婆。

大樓的院子裏有一個水泥乒乓球臺，十幾個teenage常常圍着球臺轉。大樓裏還有一些“上不了臺面”的幼兒，他們的樂園是大樓前的一所別墅。據說李富春在五

十年代初曾在這所別墅住過，上海人遷入後它成了工廠的幼兒園，同時兼作食堂，有簡單的飯菜供應單身職工。

阿歪也喜歡打乒乓球，很快成了孩子王。因為嘴歪，他每發一個球都會讓人覺得他很用力，滑稽得很。他善良可親，我不但喜歡他，還幾十年忘不了他的尊容。

雖說是嘴歪，但“戀人有戀福”，他的老婆是大樓裏最漂亮的，可稱之為“樓花”。

樓花老婆不喜歡打乒乓球，喜歡跳舞。當阿歪圍着球臺轉時，樓花和小開相擁着在舞池裏轉。轉的結果是樓花轉成了小開的老婆。

那當然是在毛澤東發出“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”的號召前的事，大樓裏類似的事件都被上海人簡而言之為軋餅頭，并未被上綱上綫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。但在後來的四清運動和文革中樓花和小開罪責難逃，受到了壓力，加上樓花在婚後并不快樂，竟選擇了自殺，一走了之，為紅顏薄命又添一例。

要是說上海大樓是黑牡丹、小開和樓花的天下，那自然是歪曲事實的。大樓裏多的是普通工人，這些普通上海人的衣食住行成了大樓裏每天發生的故事。

我們家有六口人(實為七人。因為家裏窮，大姐直到解放後才進了學校，初中畢業時已二十歲，跟着招工的人跑到四川去了)，分到了一間二十平米的臥室。大窗戶，白牆壁，不像在上海住過的木板房那樣，牆壁是用報紙糊的。這白牆壁讓我興奮了好一陣，頭一個晚上幾乎徹夜未睡，老是想睜眼看那月光下的白牆壁。

衛生條件也大有改善，走廊裏有公廁，上海小弄堂裏每天早晨齊刷刷的刷馬桶聲音沒有了，雖然我一開始很不習慣那蹲着的姿勢。

自茂兄對這種樓房公廁頗有研究，據他考證，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樓房公廁，多是簡單的一個溝槽，在牆一端設一高位水箱。由于不是人人做到便後衝洗，往往積累可觀，此時拉水，‘一掃眾糞’，蔚為壯觀。”這上海大樓裏的公廁便是如此，需要補充的是上海大樓裏的公廁因陋就簡，不分男女，僅用木板隔出單間。倘遇異性在隔壁如廁，難免遐想聯翩。有好事者甚至鑽木為孔，以作偷窺用。女性用廁時需仔細檢查一番，事先堵塞，以作防護。

民以食為天，上海人不會做面食，每個月分到的面粉票都要想方設法換成大米。因此，雖然和附近四合院裏的居民老死不相往來，但遠郊的農民却成了上海大樓的常

客。每到星期天，這些農民便推着自行車，運來一袋袋大米和上海人換面票。

大饑荒時，郊區農民無米，不來了。來而不往非禮也，大樓裏的人此時也無葷可食，每到星期天，年輕工人便成群結隊地走出去，去郊區捉青蛙吃。我父母年老，無力加入捕蛙隊，祇能“守屋待蛙”。工人們很有點階級友愛的精神，每次都有人送來二三十祇青蛙，用口袋裝着，歡蹦亂跳。那鮮味是難以忘卻的。

有一次，有人送來了一祇刺猬，并教以烹法。刺猬全身是刺，難以下手，其法是用泥裹上，放在火上烤。烤熟後掰開，添以佐料，但我已不記得其味。再後來是青蛙和刺猬都不見了，于是大樓裏有個別人抓貓抓老鼠吃，但我沒有嘗過，不知其味。



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

我記憶深刻的是，我因病休學在家，每天中午去別墅裏的小食堂買一份“無油菜”，吃得我成天都想找東西吃。管食堂的“光榮媽媽”

(兒子參軍了，母親光榮了)看着難受，有一次給了我一碟有油花的白菜吃，讓我一輩子都記得那香味。我後來一直喜歡吃炒白菜，當然，那都是放了油的。

兩架發動機

初進清華

古希臘數學家丟番圖活到八十四歲，死了也不忘數學。他的墓志銘便是一道數學題，讓過路人從他何時長胡須，何時結婚，何時生子等推算出他死時的年齡。

我母親沒有文化，不懂數學，

但她的生育史却可以和丟番圖的墓志銘PK一下：大姐、二姐、我和大妹依次相差三歲，而這四人依次相差的年齡總和恰好是大妹和小妹相差的年齡。因此，祇要你知道其中一人的年齡便可推算出其他幾個人的年齡。

年齡依次相差三歲的大姐、二姐和我居然是同一天進的學校門，那是

在解放軍進入上海後的1950年。

晚了六年上小學的大姐忍受着同班同學的譏笑，讀到初中畢業便跟着招工的人跑到了四川，晚了三年上小學的二姐中專畢業後也跑到京郊沙河當了工人。祇有我的運氣好，解放軍不早早不晚，在我該上小學的時候進了大上海，十三年後我又得天獨厚地走進了中國的最高學府。

在學校迎新站，接待我的高年級學生是

力803班的祁力群，扁圓的大臉，穿着樸素，蘇北口音。他一路幫我拎着被子，一邊介紹着系裏的情況。

六十年代初，清華最拔尖的學生被稱為“萬字號”。很巧的是，我走進校門遇到的第一個學生便是

個萬字號學生，屬小概率事件。我後來常常被人誤傳為萬字號學生，其實是完全不確的。走在祁力群身旁可算是我和清華萬字號最“接近”的一次。

文革剛結束時，不知道因為什麼緣故，祁力群曾向蔣南翔校長提到了我。據祁說，蔣答復他：“沒什麼印象，是個千字號學生吧。”(未完待續)

南京·東京連載5

南京·東京(五)



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

(接上一期)

劉洪友也笑了。原來是自己心裏惦記着去日本，才這麼聯想的。

同事和朋友見面，跟劉洪友打招呼基本上是相同的話：“聽說你要去日本留學，兄弟！好事啊！請客。”兩三個月後，同樣還是這些人，見面打招呼基本上改成：“你怎麼還沒走啊？”有時領導見到劉洪友也很吃驚：“怎麼還在這兒？證明開出去有好幾個月了吧？”這讓劉洪友感到了巨大的壓力。

他到畫廊把自己藏起來，盡量不露面，上下班的時候見到熟人也故意繞着走。劉洪友催太太羅華去打聽一下，出國手續辦到什麼程

度了。羅華說，“這才多長時間？三個多月，你以為辦出國手續那麼容易？我們女人生孩子還要懷胎十個月呢！”嘴上這麼說，其實羅華心裏也很着急。

再後來，聽說一起交材料的另一個人手續已經辦下來了，劉洪友和羅華就更着急上火了。他們終於打聽到一個有價值的消息：擔保人蜷原直義到上海了，住在虹橋附近的一家酒店裏。夫妻倆決定去上海拜見蜷原直義，當面詢問出國手續的辦理情況。給他帶什麼禮物呢？上次蜷原直義到南京時，劉洪友和羅華帶着女兒一竹去賓館看望的時候，人家給了一萬日元紅包。還錢不合適，兩人商量後決定帶上一幅林散之的字。這可是有錢也難求的無價之寶，估計他會喜歡，因為日本人特別喜歡“草聖”的作品，給他送這件雅禮，應該恰好處。當時，從南京到上海需要坐六個多小時的火車，一路上夫妻倆心事重重，連話都不想講。到了酒店門前，他們同時停下脚步。劉洪友說：“羅華，我們到那邊臺階上坐坐，再商量商量。”兩個人在下沉式廣場臺階上坐下來，討論

了半個小時。

羅華後來坦誠了當時他們復雜的心情。原來，他們通過兩個中間人才接觸到臺灣人林馬可，後來與蜷原直義在南京也祇見過短暫的一面，這次越過幾個中間人直接找蜷原直義，多少有點不信任中間人的意思。這種行為妥不妥當？再者，兩個人都不會日語，交流起來也會有障礙，搞不好還弄巧成拙把事情辦砸了。考慮到這一點，他們決定不見蜷原直義，直接打道回府。結果，夫妻倆又坐了六個多小時的火車回到南京。從此，他們便一直在煎熬中度日如年地苦苦等待日本的消息。

不管劉洪友想什麼方法繞過同事、躲過熟人，畫廊要營業，就無論如何也逃不掉與書畫家打交道。他是萬萬不敢主動去參加書法交流、筆會活動的，尤其怕遇到為他寫推薦信的老師。每次遇上了，他都羞愧難當，恨不得找個老鼠洞鑽進去。連他自己都開始懷疑，出國的事是否就這樣泡湯了。

劉洪友當時住在羅華父母家，地點位于城南內秦淮河北岸長樂路上一條狹窄的小支巷一牽牛巷。該巷崎嶇斜，僅能容一人行走，俗稱“一人巷”。元代時，這裏是集慶路總管府；明朝初年，江寧縣衙設在這條巷子的北端。這一切說明，巷子的歷史地位十分重要。牽牛巷在劉洪友的人生歷程中同樣重要，他在辦理出國手續時留的通信地址就是“牽牛巷25號”。他跟羅華談戀愛的時候，常常漫步在這條沉澱着深厚歷史筆墨的小巷裏，吟頌杜牧的《秋夕》：“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。天階夜色涼如水，坐看牽牛織女星。”

戀愛中的男女眼裏，看什麼都是最美的風景。而今，他在這裏迫切地等待着海外飛鴻，望眼欲穿地盼着郵遞員給他帶來東瀛的好消息。

那段時間，劉洪友最怕星期天休息，閑下來的時候滿腦子想的都是出國的事，盼着相關手續能早點寄來。他會情不自禁地地下樓，帶着滿滿的期盼去查看郵箱，看到裏面空空如也，失望地關上郵箱，然後希望奇迹出現，再打開。如此打開關上，反復多次。

老遠的距離，他就能分辨出郵差自行車的聲音。劉洪友至今還記得：“那是輛加重的永久牌自行車，載着兩袋郵件所以比較沉，聲音也比其他人的響，尤其那鈴鐺，車輪在不平的路面上顛簸跳躍，沒有旋緊的車鈴會發出‘叮叮’的聲響。”每次聽到這熟悉的聲音，劉洪友便會從家裏飛奔而出，往往是郵遞員車還沒有停穩，他便雙手抓住自行車把手問：“有我信嗎？”郵遞員問：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劉洪友告訴他自己的姓名。郵差說：“沒有。”下次再來，不等劉洪友問，那郵遞員就會告訴他說，“今天沒你的信。”

他一次次希望，一次次失望。一天天希望，一天天失望。那真是一種難言的煎熬，是那種絕望之前還抱着幻想的煎熬，生不如死，度日如年。

終於有一天，郵遞員在樓下喊：“劉洪友，你的信來嘍！”在床上睡覺的劉洪友聽說信來了，一骨碌翻身下床，竟然連鞋子都沒顧得上穿就衝下樓來，搶過信一看，原來是外地一個同學的來信。他大失所望，心裏頓時涼了大半截。

中間人林馬可的工作地點在深圳，他做汽車配件常常全國到處

跑。

那時候沒有手機這類方便的通信工具，很難聯系到他。好不容易聯系上，得到的回復也是那千篇一律的一句話：“別急，正在辦着。”

劉洪友已經寢食不安，心急如焚，怎能不急呢？對將來的期盼和未來的夢想都寄托在出國深造上，却遲遲不見結果。長期在這種焦慮不安的情緒下生活，劉洪友的精神和肉體都受到嚴重的折磨和損傷，飲食不規律，得了胃潰瘍，整天大把大把吃藥。家裏人都知道病根在哪裏，勸他“我們不去日本了，身體要緊”。

深受煎熬的劉洪友努力試着放下這件事，可是沒那麼容易，他心裏總是還抱着一份希望，每次回家到了樓下，第一件事還是翻信箱。星期天，他還是能在郵遞員剛進巷口時，就分辨出他那輛自行車的聲音。在希望與失望反反復復的交替中，他近乎絕望了，試着以練習書法來治療內心的傷痛，強迫自己忘掉這件事。他每天忘我地練習書法，直到精疲力盡，倒頭便睡。漸漸地，似乎忘了出國手續那件事，他輕鬆了些許。

好事多磨，否極泰來。就在劉洪友已經不再對出國抱有幻想的時候，出國的手續來了。從單位開出證明，到手續辦成，歷時一年之久，連一直關心他出國的領導、同事、朋友後來都忘記劉洪友要出國的事了。

劉洪友後來才知道，他的出國材料在日本語言學校遺失了，在原直義先生的直接督促下，才重新遞送到日本“入管局”審批。

俗話說，好飯不怕晚，也許因此更美味。劉洪友喜上眉梢，精氣神也復蘇了，像打足了氣的皮球，重新“活”了過來。